

展览的幽灵——关于出版物

作者：刘加强

“自由停泊：志作”

亚洲艺术文献库，香港

2017年1月9日–2017年3月4日



《亚洲独立艺术出版展——自由停泊：志作》展览现场 ©亚洲艺术文献库

“潜文本”——展览的幽灵

每个展览都有潜在的文本，并且不只一个。艺术展示的发生型态和机制既包含了物质形式，也构成“潜文本”——一个幽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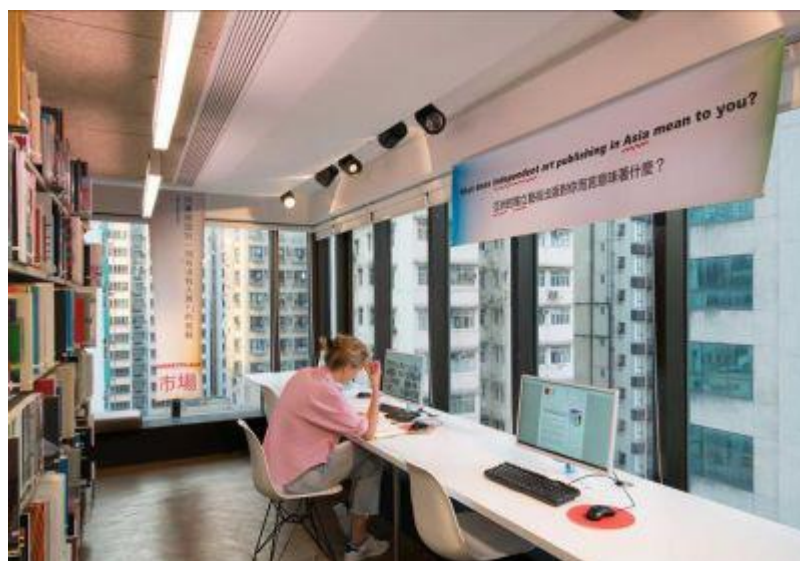
展览前言并不是这个“潜文本”，只是“潜文本”的替身，而且有很多替身。“潜文本”与展览或作品之间隔着一种转换：从知觉到思维。即使文本好像是对作品的直接书写，这写仍然不是作品本身的延伸，它交织而独立地行进，不被作品穷尽，犹如经历一个生态交错带；或是在感知的阈限（Liminality）中，文本的写成为可能，一些字词或句子以及图像构成了“潜文本”运动的契机，穿脱展览情境试图披上的外衣；文本正在写入，身体与头脑成了一页可写的纸或屏幕，操持并不稳定的节律，模糊的语言和意图编织着未曾到来或正在到来的瞬间。“潜文本”总是正在到来，它从不宣告自身的立场，基于正在到来的不确切性；在它触碰到展览中某种质地或声响以及形象前，要准备好自身的程序：清空，保持充足的动能和空间，并预留缓存的空缺。在此，出现的是对展览文本的书写（动词，过程，观念...），而不是书写的展览文本（名词，结果，物质形态...）。

既有的展览文本也并不直接作用于作品，它对作品的“潜文本”再次编辑。“潜文本”并非作品的背景或意义，以及隐而未现或掩藏的潜台词，它的性质与作品一样，提示了可见物的

不可见性及不可见程度，所以文本也并非去寻找意义。“潜文本”也不是艺术家对作品的解释或说明，或者额外的馈赠与补给，它与作品同时发生，并且两者同样重要；如果作品的一切形式都消失，它也会实时湮灭；如果它彻底消解（虚无），作品就只是物质本身，展览的情境也变成了无动于衷的空间。“潜文本”具有政治潜能，它的浮现和隐没对人们固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产生冲击。

复写——出场者

在今天，展览很大程度上即是以文本的形式存在（传播）的。惯常的做法：展览主办方将新闻稿、艺术家简历与空间讯息以媒体包的形式发送给各媒体；媒体的编辑重新切割组织媒体包的内容，利用网络编辑器格式化，再通过互联网络或移动网络发送给终端受众，或各自自媒体平台分发给所谓的“公众”，“公众”们转移到自己的社交网络或朋友圈，彼此点赞……这个过程以非常高效的节奏行进，它构成了网络中一个循环的回路，但在此之前展览或许还没有正式发生。在网络流通的文本并不是面对真实的观者，而是一个大写的抽象的他者——粉丝——这取决于媒体所吸纳社群的定位与文化阶级属性。不断产生的再次编辑与格式化，往往变成了注意力经济对读者空闲时间的掠夺，这是不对等的状态。读者处在一个毫无防备的闲者时间，而文本在后台经过了算计，至少是设计；看与听成为一种向内的写，读者不自觉被文本地写入了。



《亚洲独立艺术出版展——自由停泊：志作》展览现场 ©亚洲艺术文献库

如此，并不是观者走向展览的文本，也没有触及“潜文本”；因而每一个观众实际上是缺席的，观众只是无差别的他者。当代艺术鼓励观众成为展览的出场者，成为出场者，才能同时作为独特的观者，但实际上也常常是一种表象，参与的景观；展览成为了一个打卡的地点，一张手机里的照片，一种姿势，成为流量或数据，散布在资本操控的移动终端，在 Wi-Fi 覆盖的区域漂流，被应用程序的算法捕获。

即使观众出现在展览空间中，展览的文本也不会成为一种指导，即便它出自艺术家之手。在展览中，艺术家既不拥有观众，也不再拥有作品。因为作品实际上不是一个对象物，它从某种过程中来，这个过程没有完结。在这里，观众必须重新生产出自己的联系，重新编织和

复写，使自己出场。这一行为受到作品的鼓动或默许，而「潜文本」从外部增设了这一行动伦理（福柯曾认为布朗肖致力于这个外部）。外部既是整体的外部，也是自内生出的外部；是所有可能的外部，从空隙和断裂处生出，并一直在衍变。正是这个外部触发了展览文本的复写。



《亚洲独立艺术出版展——自由停泊：志作》展览现场 ©亚洲艺术文献库

复（数）文本——出版物

通过复写，展览或作品获得双重形式的发生。但不是再一次发生。确切来说，复写与展览是同时发生的，在作品仅仅被看到、听到、触摸到以及参与时，就已经启动了观众的评价机制：亮的黑的，强的弱的，粗糙或光滑的，清晰或昏厥……当观众或参与者在自身知觉的绝对阈限和差别阈限位移时某些东西就被写入身体，而不仅仅是被写成白纸黑字时。当再一次从身体写出变成出版物，成为了一种复写的外化，不再是完全个人身体内部的回响。

展览文本的复写，不是回复，它是复文本——复数文本但不是复述文本。回复与反思相近，沿着原来的路径折返，辩证或对抗，而复写需要出离，生产出自己的位置与空间；复述文本犹如展览或作品的投影，当它成为复（数）文本，形成断裂和错位，才能介于展览与观众之间，从影子里逃脱。尽管如此，复文本也不会是清白（独立）的，纠缠于早已被诸神抛弃的世界中；既不能掉进资本主义的深渊，听信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也要避免陷入共产主义乌托邦记忆的泥沼……艺术总是不纯的。但正是这个不纯的位置，复文本获得写的空间。

然而写不是去填满或缝合，事实上并不能刚好契合它，而总是在错位与摩擦中生产了新的创伤。正是创伤让被压抑的、潜在的东西找到出场的契机；观众或许也在寻找一个伤口，把这个伤口变为一半是自己的，一半是感同身受的。这个创伤连同作品的缺口留给正在到来的观众和复写的文本。观众遭遇展览的文本，但不会被阻挡；必须穿过它，创建一个新的文本，一个临时的新主体。当代艺术关于如何重建日常生活时间的政治，媒介、情境及其生产机制都不是搬演性的，因而独特而不可替代；文本的写自然也不只是专业批评家的事情，不凭借莫名的权威与话语对作品构成威胁，或将知识生产转变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而是接近自身与世界的权利；正因为这样，对“潜文本”的接触，也在释放更多潜在的时刻，以及丰饶多姿的生动世界。

“潜文本”衍生诸多出版物，成为展览的幽灵，就在一个小型公共图书馆敞亮的空间里，书架的迭合处与空隙中，在书架与座位的距离间，自由停泊。“潜文本”并不能在本源上得到确认，不具唯一性，是总在再次写的出版物——不论是对于创作者还是参与者——它正在到来，不是单向流通，而是互相连接与庆典，共时走向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犹如经历某种古老的过渡仪式（rite de passage）。这样的愿景是否可能期待每个”业余爱好者”（斯蒂格勒）深刻认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份额？